

香港修例风波背后深层根源

新华社香港9月4日电(记者王旭 方栋 朱宇轩)2019年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席卷香港。一个初衷是向台湾移交人犯的“修例”法案为何能引发如此巨大的动荡?

吹开喧嚣的政治泡沫,修例风波的背后有着一些香港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这些经济民生方面的矛盾成因复杂、长期未能解决,积累成巨大的社会问题。

很多青年眼中,未来缺乏亮色

都说青年人代表未来,但在很多香港青年眼中,未来缺乏亮色。

已满35岁的司机小邝酷爱摩托车,每到周末都会驾驶着大功率摩托车在郊野狂奔,这时候的他意气风发。但一谈起未来,情绪就低落下来。“未来,我们有未来吗?”没有房子,与家人挤住在一起,住了多年的女友无法结婚,生儿育女的念头早已没有了。租房?30平方米房子月租金动辄八九千港元,小邝每月进项不过1.5万港元左右,如何能租?至于攒首付买房,更是想也不要想。你攒钱的速度绝对比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

对比一下香港房价上涨幅度和收入上涨幅度,可以看得很清楚:目前,香港不同区域、房型价格不等,但绝大多数都在每平方米20万港元以上。而月收入呢?一位市民向记者表示:“20年前,大学毕业生就拿一万港元了,20年过去,涨到一万二、一万三,这20年,物价涨了多少?算上通胀,大学毕业生实际是贬值的。”

按国际劳工组织2018年的数据,从2008年到2017年,内地的实质薪资成长率高达8.2%、澳门1.6%、韩国1.2%,台湾的实质薪资成长仅0.2%,香港甚至落后于台湾,只有0.1%。而从2004年至2018年,香港房价涨了4.4倍。

正是房价高涨、薪金收入停滞,导致香港自有住房比例下降,从2003年至今,香港的住房自有率从53%下降到48.9%。这个数据的背后,是财富更加集中,是多少青年自有住房梦破灭。

像小邝一样,假如只活在当下,不考虑房子,吃喝、逛街、郊游倒也不愁,只是“千万不要去想未来”。

中产的“坠落”焦虑

中产阶级一向被认为是中坚力量,是社会的稳定器。但在香港,这个稳定器正在失灵,担忧向下坠落的“中产焦虑”在香港尤为突出。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前局长张炳良对此有个概括叫“中产阶层的基层化”,何意?“就是说,这个阶层的教育水平、文化认同是中产,但实际生活已经达不到中产阶层的水平,与基层趋同”。

在香港,2018年月薪中位数为1.75万港元,公务员和教师中位数2.84万港元,论整体收入已经相当高。但张炳良透露,他做局长时做过公务员住房的小调查,惊讶地发现,不少人买不了房子,有的甚至住在劏房(指一个住房单位被切割成多个很小的居住空间)中。

就香港而言,房产,是富人的财富,是中产昂贵的门票。没有退路的香港中产,为了获得这张门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包括极高的负债、透支性的消费以及束缚性的职业生涯。所谓香港中产,就像在房子这个通道里的沙子,随着房价波动,在有产和无产两端之间来回颠倒。

持续增长的高房价,将香港社会撕裂成有房者与无房者两大对立面。没“上车”(拥有住房)的想“上车”,“上车”的立刻变成高房价的维护者。正是各种不同利益主体的复杂纠葛,让香港特区政府左右为难,动辄得咎。近来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为应对土地供应不足而推出的东大屿山填海计划,作为一计解决房屋问题的长远方略,却遭到了很多人的无端质疑。

上升通道狭窄,“哑铃型”社会成型

作为一个高度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社会,香港仍有数量不少的穷人。香港社会贫富差距大、阶层固化的背后,是产业的高度单一和空心化。

根据统计,2016年,香港显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539,已大大超过危险警戒线的

0.4,与部分拉美国家持平。尽管特区政府为解决贫富差距做出了不少努力,但社会福利水平与香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很不相称。

在健康的社会里,青年和基层人士通常可以通过就业、教育等途径实现向上流动。但香港的社会阶层却基本固化,例如,位居富豪榜前列的人士多年未曾变化,基本都是地产商及其家族。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而产业空心化是青年上升通道日渐狭窄的主因之一。

在20世纪70年代香港有将近一半的劳动者是产业工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香港金融、航运、商贸物流、服务业兴起,管理、行政、技术、金融及专业人才吸纳众多劳动力,跨入中产阶层。但在随后的产业升级中,在原有商贸、航运之外,只发展了金融、旅游等服务业。

林郑月娥:就打破困局提出四项行动

新华社香港9月4日电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4日发表电视讲话,提出打破目前困局的四项行动,包括:保安局局长在立法会复会后,按《议事规则》动议撤回条例草案;全力支持监警会的工作;从本月起,行政长官和所有司局长走入社区与市民对话,一起探讨解决方法;邀请社会领袖、专家和学者,就社会深层次问题进行独立研究及检讨,向政府提出建议。

“科创产业没能发展起来是香港的一大痛点,”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荣休教授雷鼎鸣说,“香港金融业占到了GDP的约19%,但只提供约6%的就业。”金融业创造财富的能力惊人,但只能吸收少数本土精英青年人,大部分本地青年没有能力从事高端服务业,何况许多香港金融从业者更是来自海外的人才。

对于当前的局面,特区政府曾尝试采取多种手段予以改变,但科技创新产业几次努力,几次夭折。这其中,反对派曾出于政治目的进行过种种无端阻挠,比如特区政府为推动创新科技发展而成立的创科局,反对派为反而反,不顾社会一再呼吁停止政治虚耗的呼声,在立法会百般阻挠,生生拖了三年。

这直接导致香港制造业产值时至今日仅占香港GDP的1%左右,吸纳劳动力寥寥无几。

林郑月娥强调,持续出现的暴力正动摇香港法治的根基,极少数人挑战“一国两制”,冲击中央政府驻港机构,污损国旗、国徽,将香港推向危险的境地。无论市民对政府或对社会现状有多大的不满,暴力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目前,最迫切的就是要遏止暴力、捍卫法治,重建社会秩序。政府会对所有违法及暴力行为,严正执法。

“港独”“台独”勾连合流极度危险

“反中乱港”分子黄之锋、朱凯迪、岑敖晖日前窜访台湾,密会民进党和“时代力量”等,大肆歪曲香港局势真相、污蔑特区政府和警队,更诋毁“一国两制”、直接攻击中央政府,言行之张狂与恶毒完全暴露人性之阴暗与扭曲。更当警惕的是,“港独”“台独”在香港局势和台海局势均处于高度敏感节点上勾连合流,政治黑手直指分裂国家,具有极度的危险性。

黄之锋8月30日因涉嫌煽惑非法集会和参与非法集结等罪被警方逮捕,之后获准保释,就“急急匆匆”更准确说是“兴冲冲”飞往台湾。在香港参与暴力犯罪证据凿凿的黄之锋一到台湾,就上演颠倒黑白、扯谎造谣的拙劣老戏,明明是一小撮激进分子大搞暴力、制造“黑色恐怖”,到他嘴里却成了“特区政府用戒严和白色恐怖压迫港人”,朱凯迪还编出“示威者在警局遭到酷刑”的“狗血剧情”。这些人以为“过海”就可“瞒天”,丑态尽出,叹为观止。

黄之锋之流更肆无忌惮之处,在于把到了台湾当成了“外国”,赤裸裸将矛头直指“中国”,将炮口“瞄准”中央。他们大肆抹黑“一国两制”,虽是陈词滥调,但却更激烈、更放荡、更嚣张,虽口称为香港谋民主自由,实则更直接挑战“一国”底线。这些人已完全暴露企图分裂国家民族的真面目!他们之前还处欧美“拜主子”“求保护”,现在跑到台湾“拜老师”“求盟约”,根本就是在出卖香港,更要出卖国家,为的完全是自己那点不可告人的政治私利。

如此人格坍塌的违法暴力煽动者、参与者,到台湾竟成了一些政治势力和政客的座上宾。这厮黄之锋之流大放厥词,那厮蔡英文当局、民进党、“时代力量”等大肆唱和。黄之锋妄言“台港是命运共同体,同样面对中国政府压迫”,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飞帆则应和“香港问题是国际问题,呼吁中国停止打压台湾、香港”。这不是“港独”与“台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又是什么?!

“港独”叫嚷“要让明日香港成为今日台湾”,“台独”高喊“莫让明日台湾成为今日香港”,二者都企图把攻击“一

国两制”当成捞取利益的政治提款机,表面看来卿卿我我,实则各怀鬼胎。明眼人一目了然,黄之锋之流此次入台,一番“诉苦”后紧接着就袒露心机,提出希望台湾修订所谓“难民法”,而对于这一“港独”的“求后路”算计,蔡英文当局和民进党哪里能“中招”。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演技高超”,先说“看到香港人民被任意殴打、逮捕,连坐在车厢里的人民跪地哀求都不可免”,再称“现行法律完备自如”,一招半式就“打脸”黄之锋之流。

对于“港独”“台独”合演的这出戏,有台湾舆论讲得挺到位:“只能当生意不能当真,他们是在互相取暖”。这桩生意的双方,可谓一“小巫”一“大巫”。黄之锋之流“自我感觉”太良好,但蔡英文当局和民进党也别自以为是高明。过去三个月来,蔡英文当局不断发声介入香港事务,借机大肆攻击“一国两制”,用以激发岛内“反统”“反中”“恐共”意识,为的完全是拉抬选情“拼连任”。对蔡英文和民进党的危险动作,岛内舆论已多次告诫:如此“煽风点火”无异“火中取栗”,是把台湾绑在战车上推向险境。有评论人士更直言:“不难看出民进党是在借由香港纷扰扩大事端,甚至坐实美国与‘台独’人士在背后支撑‘港独’的揣测,这就更是拿台湾人民去当民进党偷渡‘台独’的陪葬品。”

事实很清楚,为谋取各自都极不堪的一己私利,“港独”不惜毁掉700多万香港市民的安宁幸福,“台独”则拿2300万台湾百姓的利益福祉当筹码,他们都完全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更站在了整个中华民族和14亿中华儿女的对立面。我们要对欲求苟合的“港独”“台独”发出最为严厉的警告: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意志,谁胆敢搞分裂,必将背上民族罪人的千古骂名,必要承受咎由自取的严重恶果。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新华时评

政治争拗持续,难题更难消解

高房价、贫富差距、青年难以向上流动。这些社会问题早已暴露,回归22年来,历届特区政府也都做出过不同程度的努力。但迄今为止,收效甚微,民怨难以消解。这是修例风波一经煽动就爆发的重要原因。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田飞龙说:“回归以来,由于多种原因,特区政府确实没能更多地通过政策保障、民生保障合理地去解决香港的社会民生问题,导致香港有很强的内生动力将经济民生议题政治化。”

不可否认,有些民怨确实是特区政府政策上缺乏远见所导致的。但香港深层次矛盾之所以难以化解,既有政治架构上的互相牵制,造成施政困难;也有政府举措失当,还有长期以来自由市场理念下,教条式执行“小政府、大市场”的理念带来不作为的问题,而最主要的是,反对派不断制造和挑起政治争拗,罔顾经济民生大局,人为制造了各种困难。

这些因素盘根错节,再加上各种利益集团各有所好,别有用心者趁机搅局,结果问题不断在讨论,措施迟迟不能出台,时间流逝,矛盾积重难返。

典型莫过于提高房屋供应量。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提出了每年增加8.5万套住房的计划,但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房价大跌,计划只能取消。

考虑加大土地供应量,随之而来的是无休止的争议。很多人以为香港“人多地少”,但香港超过1100平方公里土地中,实际的土地开发程度为24.3%,住宅用地仅占6.9%。在未开发的75.7%的土地中,划做郊野公园的就占42%,就算为环保考虑不开发,还有300多平方公里可用。但争议多年,开发仍遥遥无期。

特别是这些年来,反对派为争夺管治权,人为制造政治争拗,大大增加施政成本。比如在2010年,一位香港老太受反对派所撺掇哄骗,提出港珠澳大桥影响环保的司法复核,尽管政府官司打赢,但仅此一项,工程延宕一年多,造价增加65亿港元。其他类似经济、民生动议,不管是政策还是拨款,反对派都要使尽解数,制造各种阻挠,把立法会当政治秀场,绝不会考虑多数市民和香港社会发展的需要。

香港多位政界人士对这种什么事都干不成的所谓“民主”深恶痛绝,在与记者的谈话中,反复提及“千万不要搞这种民主”。

谁将答对第三次考题

修例风波中,反对派借着香港近年来出现的封闭、排外思潮,拼命把内地形容成洪水猛兽。

黄晞华,一个29岁的香港青年,对社会上某些人把对特区政府施政的不满延伸到中央、延伸到内地十分痛心。

他忘不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带给港人的骄傲,也忘不了汶川地震时血浓于水的两地深情。对于香港社会现存的某些情绪和碰撞,他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待:“这些冲突和矛盾,我个人认为是在融合期必然发生的,是两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观融合的时候必然面对的。”

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对反中乱港分子挑动排斥内地嗤之以鼻:“香港产业空心化、市场规模有限,有自我‘造血’的能力吗?很多香港人眼睛只知道往西方看,但是回头看看,看看祖国的发展,会发现更有发展机遇。”

香港经济学会顾问刘佩琼说:“封闭并不能带来发展机会,现在的年轻人不理解,如果香港真的和内地隔离,会更糟糕,面对目前的经济困境,香港需要和內地的连接更加密切、更有效,现在出现的相反的思潮实际上是在把香港推向深渊。”

对祖国的发展有没有信心?历史老人曾经在1997年出过一次同样的考题。在回归前夕,一批心存疑虑的香港人,慌慌张张远走他乡。但最后的事实证明,他们做了人生中最为错误的选择,错过了和祖国一起发展的良机。

历史将再一次证明,热爱自己的祖国不仅仅是正义和正确之举,更是远见和明智之举。希望20年以后,今天的香港青年会骄傲地回答: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